

谨以此书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第二十辑

北大讲座

《北大讲座》编委会

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 / 沙健孙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 欧阳哲生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新起点 / 耿云志

蔡元培校长与五四运动 / 肖东发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 王奇生

决定中国命运的五四一代 / 张永

五四运动有多重要 / 杨奎松

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儒家文化的命运 / 卢晖临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第二辑

北大讲座

王康讲读 傅雷讲读

王康讲读 傅雷讲读 王康讲读 傅雷讲读

王康讲读 傅雷讲读 王康讲读 傅雷讲读

王康讲读 傅雷讲读 王康讲读 傅雷讲读

王康讲读 傅雷讲读 王康讲读 傅雷讲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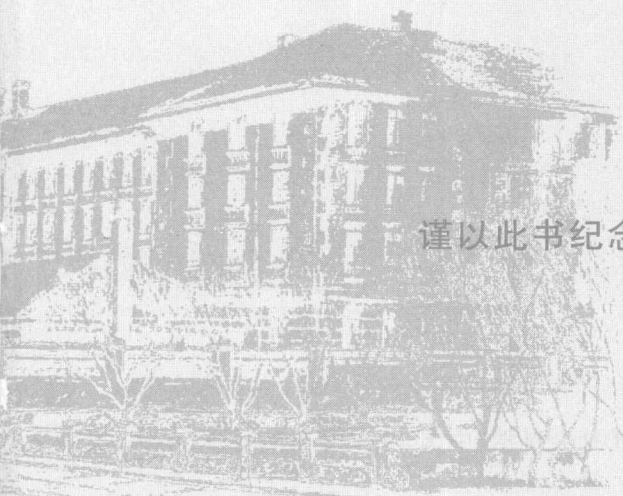
王康讲读 傅雷讲读 王康讲读 傅雷讲读

王康讲读 傅雷讲读 王康讲读 傅雷讲读

王康讲读 傅雷讲读 王康讲读 傅雷讲读

王康讲读 傅雷讲读 王康讲读 傅雷讲读 王康讲读 傅雷讲读

傅雷讲读 王康讲读



谨以此书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第二十辑

北大讲座

《北大讲座》编委会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讲座. 第20辑/《北大讲座》编委会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301-15164-8

I. 北… II. 北… III. ①社会科学-中国-文集②自然科学-中国-文集 IV. Z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2082号

书 名: 北大讲座(第二十辑)

著作责任者:《北大讲座》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胡利国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5164-8/G·260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hlgs0380@sina.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26754962
编辑部 62765016

印 刷 者: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8.5印张 285千字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北大讲座》编委会

主 任：周其凤

副 主 任：张 彦

成员单位：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

北京大学教务部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讲座》(第二十辑)编委会

主 编:韩 流

副 主 编:郑清文

执 行 主 编:于家明

执行副主编:庄姝婷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划排序)

丁雪晨	马天骄	马 畅	马梦璇	王大林
王玉珏	王怡丹	冯 丽	卢武习	申禹杰
刘 健	那 威	孙宪明	孙 硕	何方竹
李 可	李 果	杨 鹏	张友谊	陈 特
林清祥	周光照	胡 吉	胡 明	钱 涛
徐 杰	黄世哲	黄成玉	黄劲草	雷 蕾
熊 丹	薛 元			

目 录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欧阳哲生(1)

北大与五四运动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北京大学的历史是从戊戌变法这一年开始的;蔡元培的整顿使北大真正成为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新起点 耿云志(15)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开端,开启了中国政治革命的新阶段;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造成了中国文化复兴的一大枢纽。总结五四以来的经验,我们应当充分注意克服激进主义、泛政治化和迷信群众运动给我们的事业带来的危害,以理性平和的心态面对一切问题,以目标和手段相统一的观念和方法去解决各种问题。

蔡元培校长与五四运动 肖东发(31)

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前的北大,确实腐败不堪,糟糕透顶。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后,对北大实行整顿,改造旧北大,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北大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宣传马列主义的基地,和蔡元培校长对北大的整顿是分不开的。

五四运动有多重要 杨奎松(55)

五四运动的背景:(1)当时有一大批留洋归国的留学生,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已在高校和文化界占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2)国内有了大批新式学校,有数量庞大的青年学生群体;(3)有西方发达国家作榜样;(4)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5)有了过去变革或革命失败的教训;(6)当时中国的现状与世界潮流和先进国家差距太大,对国人产生强烈刺激;(7)当时的中央

府是一个弱势政府,五四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和被迫从传统转向现代的一个必然会发生的历史环节。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王奇生(88)

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儒家文化的命运

——兼评五四……………卢晖临(113)

从历史的角度解读近百年来儒家文化的历史变迁,如何对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历史,值得我们深思。

五四新文化主题与李达的“物心两面改造”方案……………刘志光(125)

从文化的角度,演讲者就五四文化主题与李达的理论探索作了一个历史与思想的梳理:(1)中国文化中“大同”社会理想的导向作用;(2)中国社会与文化改造的双重任务:物心两面改造;(3)“物心两面改造”与道德主义。

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沙健孙(136)

(1)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2)对五四时期几个重要问题的认识;(3)五四运动与青年运动的方向,今天的青年应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决定中国命运的五四一代……………张永(151)

(1)五四青年的产生;(2)五四运动的萌芽、发生、发展和尾声;(3)五四青年一代的梦想和实践;(4)开辟中国发展新道路的五四一代。

五四背景下的中国民俗学……………王娟(171)

从京剧舞台看五四思潮的社会局限性……………罗检秋(184)

中西价值观的渊源与比较:家一国一天下……………辜正坤(199)

(1)文化概念:一切文化都是合理的,但在相当的层面上也有高低优劣之别;(2)判断一个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3)中西地理环境与中西社会结构的契合关系;(4)家族社会结构是人类最伟大、最理想的社会结构;(5)家族社会结构是解释文化先进与落后的最关键的谜底;(6)中西焦点价值观个案比较:义务与自由;(7)中西政治专制与经济专制同轴反向互构论;(8)家国主义与邦国主义;(9)人类文化的最高追求(最先进文化)及实现方式。

儒、道、佛三位一体与中国人的文化精神结构……………樊浩(219)

(1)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需要儒、道、佛;(2)儒、道、佛一体的文化精神形态

态与文化精神生态;(3)“入世中求出世”的文化境界与人格追求。

人道和自由:社会治理的最高道德原则	王海明(236)
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反思	徐万民(258)
成长·成才·成功	孙祁祥(268)

(1)打好三个基础,学好专业基础知识,学好数学,学好英文。(2)坚持五个原则:第一,学会放弃;第二,不轻易随大流;第三,开阔视野;第四,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第五,日积月累。(3)培养六个方面的素质和品德:第一,有一颗感恩的心,感激父母,感激生活;第二,懂得欣赏;第三,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第四,关注细节,追求卓越;第五,信守诺言,一诺千金;第六,心态平和,善于合作。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 欧阳哲生

〔演讲者小传〕

欧阳哲生,1962年5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之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欧阳哲生讲胡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科学与政治——丁文江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编有:《胡适文集》(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傅斯年全集》(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丁文江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等多种文集。主编:《海外名家名作丛书》(岳麓书社版)、《人文中国书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版)、《京华往事丛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版)。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讲到五四运动,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自豪地联想到我们的母校——北京大学。因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九十年前的5月4日带领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震惊中外、被后人称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伟大事件。讲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也会首先提到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和一批著名教授,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陶孟和、周作人、刘半农、鲁迅等,他们是我们的“校宝”,也是中国的“国宝”级人物。当然,回忆北大的历史,我们就不能不写到五四运动或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北大校史上非常重要、光彩夺目的一章。北大之成为北大,是与五四运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今天我讲这个题目,就是对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一个纪念。

关于五四运动,一般有两种理解,一是从狭义上来说,它是指1919年

5月4日的五四事件和随之而起的、风起云涌的爱国救亡运动。它的时间范围相对短,一般是指1919年五六月这段时间。人们最初主要是从这一个角度来命名和理解这一运动。一是从广义上来说,它是指从《新青年》创刊或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种种革新运动,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工和罢市、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它的时间范围比较宽泛。或指从1915年至1921年中共成立,到1923年12月科学与玄学论战止。这里的五四运动实际上也就涵盖了前此和当时还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现在看到的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彭明先生的《五四运动史》这两部专著都是从这个角度来把握和撰著五四运动史的。

不管是从狭义的角度,还是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五四运动,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与北京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将北京大学与这两个运动联系在一起,从历史的观点看是一件当然的事。北京大学因为在这两大运动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确立了它在近代中国知识界的特殊地位。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因为有了北大这个角色的领导,因此产生登高一呼、“一呼百应”、时代风气为之转移的效应。

今天我想借这次演讲的机会,与大家一起讨论三个问题:为什么北京大学的历史是从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开始讲起?为什么说是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奠定了北大作为现代中国大学的范型?为什么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如此重要,以至被看成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标志?

一、北京大学的历史是从戊戌变法这一年开始

关于北京大学的历史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创办,北京大学的历史自然应从戊戌变法这一年算起。这是民国以后新派的意见,也是一种主流的意见,蔡元培、胡适这些人就是持这种观点。民国以来北京大学就是沿用这种观点来办理自己的校庆活动,如民国六年(1917年)的二十周年校庆、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二十五周年校庆、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三十一周年

纪念、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的五十周年校庆,都是以此为根据举办校庆纪念活动,出版校庆纪念刊。1998年北京大学举办了举世瞩目、空前盛大的百年校庆活动,掀起了中国大学校庆的高潮,也是沿用民国时期的惯例。

按照这一说法,北京大学的历史并不长,至今不过110周年。在世界大学中,不要说与欧洲那些古老的名牌大学,如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法国的索邦大学、巴黎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意大利的萨劳诺大学、博罗尼亚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相比,就是与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相比,我们北大的历史也短得多。真是相形见绌!用胡适当年的话说,北大在世界大学中,只是一个小兄弟。1936年9月,哈佛大学举行三百周年纪念活动,盛情邀请世界上各大学派代表参加这一校庆活动,结果有五百多所大学派代表前往道贺。胡适代表北大参加这一活动。各校代表按校龄排座,北大排在第419号。作为中国高校龙头老大的北大排在这个位置,胡适感到很惭愧,他经常向国人谈及这个故事。1948年12月北京大学举办五十周年校庆,胡适感慨地说:“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五十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兄弟,怎么配发帖子做生日,惊动朋友赶来道喜呢!”

有一些先生不同意上面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是千年文明古国,作为中国大学的老大——北京大学,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这实在说不过去。早在西汉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中国就创办了古代的大学——太学,晋朝晋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76年)设立了国子监,也可以说是那时的高等教育机构,北京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太学或国子监,这样自然可以将北大的历史拉长。如依这种说法,北大的历史就有两千年,或者至少有一千七八百年。已故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健在的季羨林先生就持这种意见。冯友兰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一文中认为:“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我所以认为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不相称。”季先生在为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一书作序中也明确表示“北大的校史应当上溯到汉朝的太学”。如果这样算的话,北大就比英国的牛津、剑桥,德国的柏林这些欧洲大学历史要长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就

更不在话下了。北大不仅是中国的老大,而且在世界大学中也位居前列。

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将北大的历史追溯到晚清的同文馆。同文馆设立于1862年,最初只是一个语言学校,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一所多种学科的、综合性的高等学堂。京师大学堂创办时,同文馆还存在,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我以为京师大学堂与同文馆的主要区别在于:同文馆是以西学为主,而京师大学堂是中西并用或中西并举,这也是北大的一个传统。当然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对京师大学堂的学风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京师大学堂对西方语言文化的教学高度重视,与此有一定关系。但京师同文馆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带有一定的殖民色彩,北大人不认同它作为自己的源头。

我本人倾向于现在通行的意见。《诗经·大雅·文王》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作为中国文明精华承载体的北大,她的历史使命是在创新,北大精神贵在革新,北大的生命力正在于此。将北大的生日定在戊戌维新这一年,表达了对北大精神的这样一种理解。

大家知道,1898年这一年是戊戌维新。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皇帝在短暂的“百日维新”里就下达了上百条变法令,其中一条就是7月4日下达的设立京师大学堂的法令。京师大学堂按照梁启超所拟定的章程,有两个不同于中国传统学校和书院的重要特点:一是中西并用,不得偏废,表达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意向。二是讲究实事求是,不像过去的书院虚应故事。京师大学堂尚在议定酝酿之中,变法就因慈禧太后的镇压而中止了。在这不幸之中包含一个万幸,就是慈禧废除了新政,但唯独保留了京师大学堂。所以,胡适称北大是戊戌维新的遗腹子。1898年11月,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初办的京师大学堂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以经学、理学、掌故学、诸子学和初等的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体操为普通学科,以高等的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为专门学科。初创时还带有一定的旧学气息,但一所综合性的大学毕竟粗具雏形。以后,北大又历经磨难,八国联军侵华时曾一度停办。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5月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任校长。严复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传播西方学术思想的第一人。

严复在北大任期很短,他为北大争取经费,为使北大不致停办,做出了特殊贡献。民国初年,由于北京处于袁世凯的严密控制之下,北大虽有所发展,但校内的守旧气息浓厚。直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北京政府的人事发生新的更动,范源濂就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才被起用担任北大校长,北大才出现新的可能改观的契机。

二、蔡元培的整顿使北大真正成为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

1916年9月,正在法国流亡的蔡元培接到新任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来电,促其回国担任北大校长。蔡于12月中到达上海,他在沪征求友人的意见,有人主张他不要去北大,因为北京也好,北大也罢,都是腐败不堪的地方。也有人认为,腐败的地方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当时孙中山先生就认为蔡元培应该去,说这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可见,蔡元培的上任,有秉承革命党人意旨的一面。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孙中山先生更是致电北大的同志,呼请“率三千子弟,助我革命”。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蔡元培走马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北大进行改革和整顿。

(一) 阐明大学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学术人才,而非使人升官发财,培养学生以钻研学术为指向的学习志趣。

京师大学堂的官僚习气很重,学生都把大学堂当作做官的敲门砖,无心治学。学生们都愿意做官品较高的老师的门生,因为这样可以在毕业后有好的出路。蔡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提出改造北大的三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旨意。^①他说:“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而“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

^①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9页。

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包括实行选科制,培养学生对所学专业和课程的兴趣。创办各种刊物,诸如《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等,傅斯年等新潮社成员创办《新潮》杂志时,蔡先生从北大大年度4万元的经费中拨出2千元资助,为师生发表学术研究成果提供园地。鼓励创办社团,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创建研究所,为师生提供进一步研修的学术机构。通过这些举措,校园的学术空气逐渐浓厚起来。

(二)教师聘用视其才学为原则,聘请学有专长的人来校任教,这是对京师大学堂所积官僚旧习的一次重大改革。

为培养校内的学术空气,蔡元培在教员聘请方面,延聘学有专长者来校任教,辞退旧教员中滥竽充数者。蔡元培最先请到的是陈独秀,他当时正办《新青年》杂志,影响很大,是思想界的一颗明星。但陈独秀没有教过大学,又忙于办杂志,不愿意来北大。蔡元培就亲自登门拜访,他的诚恳约请打动了陈独秀。蔡元培为表示邀约的诚意,他说:你来北大,杂志也可拿到北大来办。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也跟着他由上海搬到了北大。所以蔡请陈,等于是将新思想的重心由上海转移到了北京,这真正是高明的一步棋。

蔡元培还聘请了李大钊、周作人、刘半农、胡适等人来校任教,这样在北大文科就形成了一个新派阵营。其中胡适、陶孟和两人作为美国、英国留学生的代表,又向蔡校长推荐了一些在美、英留学且品学兼优的“海归”学生。蔡元培请人,主要是看其是否有一技之长。有一些旧派人物,如他确有专长,蔡也请他。这方面最典型的两例就是辜鸿铭、刘师培。辜氏以清朝遗老自居,到了民国,仍在脑后保留一根辫子,加上他是一个混血儿,他的出现是校园内的一道风景。但他的英文堪称一流,所以蔡先生仍然请他作英文教授。刘师培则因名列筹安会、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而被国人诟骂,遭到通缉后躲在天津闲居。刘的中古文学修养甚深,所以蔡先生请他来北大教国文。有些外国教员不学无术,滥竽充数,蔡元培顶住压力,把他们给裁掉了。有位被裁掉的英国教习与英国公使朱尔典有关系,朱出面干预,威吓蔡元培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了”。蔡先生不予理会,一笑置之。

为保证教学质量和改善教员的结构,蔡元培做出了六条特别规定:“(1)本校专任教员,不得兼他校教科;(2)本校教员授课以二十小时为

度;(3)教员中有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4)本校兼任教员,如在他校兼任教员,如在他校兼任教科者,须将担任钟点报告本校;(5)兼任教员,如在本校任课十二小时者,兼任他校教科钟点,不得逾八小时以上。(6)教员请假过多,本校得扣其薪金或辞退。”^①这六条中,特别是第三条,即“教员中有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对旧的官僚习气是致命的一击。按照这一成规,如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先生,在北京政府担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幹,因在政府部门任职,故均只被聘为北大的兼任讲师。

(三)为发展学术,给学术研究提供广阔的空间,特别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派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是蔡元培的一段名言,也是他治理北大的指导思想。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蔡先生对各种思想、各种主义、各种见解都取一种包容的态度,使北大成为新思想的生长地和外来思潮的主要输入者。蔡元培在北大的这一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使北大成为各种新思潮的源头活水。因此,人们把蔡先生看作是“新文化运动的保护人”。

(四)在校内实施“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

北大原有管理体制是师法日本,如设立学长,各学科称“门”。近代大学制度起源于德国,蔡元培曾在德国大学访学,对德国近代大学的精神有深入的体验。他主张学习德国,兼收美国、法国大学的优长。在管理方面,设立评议会、行政会议,其精神实质是教授治校。在教务方面,实行选科制,设立研究所,为学生进一步深造提供渠道。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这在中国大学是开创性的。还有废门设系,调整学科结构,以利管理。这些都使北大真正从旧的官僚体制中摆脱出来,脱胎换骨,北大的整

^①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个面貌焕然一新。

(五)调整北大学科,确立以文、理两科为重点的发展方向。

关于大学的学科设置,蔡元培有一基本看法:“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目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似也。鄙人初意以学为基本,术为枝干,不可不求其相应。”因此,蔡先生强调大学,特别是像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应该以基础学科建设为主,民国初年他担任教育总长时制订的《大学令》第三条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北大原有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学生为谋求仕途,都愿选择法科,文理科门庭冷落。冯友兰先生述及他报考北大时,当时大家都愿意报考法科,而冯先生则选择了哲学门,当时的招考官颇为奇怪冯友兰的这一志愿,但冯友兰义无反顾地坚持要入哲学门。这样,中国少了一位法官、一位律师,但多了一位大哲学家。冯先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详细谈及这一故事。蔡元培原来设想:(1)扩充文、理两科,(2)法科预备独立,(3)商科归并法科,(4)截止办工科,(5)改革预科。实际推行者有(1)、(3)、(4)、(5)项。蔡先生这种以文、理科为主,重视基础学科研究的构想对北大以后的学科建设影响深远,北大学科的发展基本上沿承了蔡先生指定的这一方向。

纯正的学术志趣、浓厚的学术空气、自由的思想氛围、民主管理制度、重视文理科建设,这些是近代大学的基本要件,也是蔡元培整顿北大所追求的目标。蔡元培先生的上述改革,主要是受到了西方教育思想(特别是德国大学制度)的影响。蔡先生在北大的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确立现代大学教育制度。京师大学堂“自开办至民元,十数年中经过好多波折。这个时期,学校的制度大概是模仿日本的”。开办之初,学校方针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教所学偏于旧学。民元以后,将经科并入文科,学长全用西洋留学生,“大有完全弃旧之概”,然旧之官僚习气依然浓厚。蔡先生全面整顿北大,不仅荡涤了学校的旧习气,而且取法欧美的大学办学方法,建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体制,成为中国大学的一个范型。正因为如此,蔡元培虽然不是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也不是北大的第